

中国民俗学发展的几个阶段

刘铁梁

自本世纪10年代末发端的中国民俗学,经历了近80年曲折的发展过程。关于它的历史,以往陆续发表过不下20篇综合性的论述,至于对其中重要学术代表人物或各种局部性问题的论述就发表更多。进入90年代以后,我们见到了张紫晨所著的《中国民俗学史》(1993)和王文宝所著的《中国民俗学史》(1995)这样两部专著^①。两书都不仅详细叙述现代民俗学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对于中国古代记录和认知民俗现象的历史情况也给予重视。特别是长达68万字的张紫晨所著一书,“古代民俗学”部分占四分之三以上,可以说是第一部系统清理中国古代有关民俗文献资料的学术史著作。此外,我们还见到美国华裔学者洪长黎撰写的《到民间去——1918~1937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中译本(1993)和《战争与大众文化》英文本(1994)。去年,北京师范大学赵世瑜完成并通过答辩一篇博士论文《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918—1937)》。^②可以说,关于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正在进入一个深入探讨的阶段。

“中国民俗学”从严格意义上讲,应当是指中国出现现代科学以后形成的一门独立的人文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本土社会中广大民众的传承文化,但思想和学术视野已具有世界性,理论和方法也均进入到世界性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潮流之中。所以,中国古代对于民俗的记载和议论,尽管历史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今天中国民俗学的学术特点,但仍然应该被看作是这种民俗科学的“学前史”。本文仅利用有限的篇幅,提要式地叙述中国民俗学从1918年正式出现之后直至今天的发展过程,并按照我的理解来划分它的几个阶段。

一、发起阶段:五四时期的歌谣学运动(1918—1926)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兴起了征集和研究歌谣的学术活动,中国民俗学从此开始起步。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登载了一篇《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号召师生和全国教育界人士关心或实际开展搜集歌谣的工作。简章通过对歌谣入选条件的规定,表达了征集歌谣的意图,即是为考察“人情风俗、政教沿革”和民众的思想情绪等。简章要求歌谣作者,必须对方言俗语加上注音,对“历史地理”背景给予注明,对于其中的歌曲也要谱记其音乐等,这种科学搜集方法的提出也是史无前例的。民俗学以征集歌谣为起点在中国发生,于此可见端倪。之后不久,《北京大学日刊》在一年时间里共发表148首全国各地的歌谣。北京、上海等地的报纸也受其影响,刊登歌谣作品。1920年北京大学成立“歌谣研究会”,1922年12月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俗学刊物《歌谣》周刊。周刊的《发刊词》明确说明了搜集歌谣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民俗学的研究,认为“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资料”,而“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二是为了发现歌谣的文艺价值,即“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同时根据“人民的真感情”,使新的“民族的诗”产生。这样两个目的的提出是非常有号召力的,因为当时的知识界正涌起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两大旗帜的新文化运动。民俗学在国外是一门已经形成有半个多世纪的现代人文科学,同时它把普通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作为研究对象,体现出重视民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态度,因而倡导民俗学就和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完全相合。此外,中国民俗学是由歌谣的征集和研究开始的,这种情况与新文化运动另一种提法“文学革命”有直接的关系。文学革命的宗旨首先是“要用民众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来促进新文学的产生,进而取代已经陈腐的古典文学”,其次也“在于抗议传统文化中的诸多观念与制度,并使男女民众的思想,从传统的羁绊中跳脱出来”,“最后,这种运动,意外地使人们深深洞悉了自己的文化遗产,而且指引了欲以现代历史批评研究法来探索一切的人。”^③所以说,歌谣学事实上是文学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积极组织 and 参加歌谣学活动的代表人物,大多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有影响的一些学者,他们是:刘半农、周作人、胡适、沈兼士、钱玄同、常惠、顾颉刚等。

《歌谣》周刊到1925年6月,共出版了97期,之后并入到《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继续发表民俗学资料和论文,至1926年8月告一段落。在第48期以前的《歌谣》周刊上所发表的几乎全是歌谣作品和讨论歌谣的文章,而从第49期以后发生了一个明显变化,增加了传说故事作品和对风俗进行描述的文章,这表明民俗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及用力程度都在不断加强。另外,结合着歌谣记录的技术问题,讨论方言的论文也发表不少,其中有一些纯粹属于方言学性质。

《歌谣》周刊上的论文,最初所讨论的内容集中在如何研究歌谣方面,以后逐渐开始面对具体问题,进行探索性和示范性的研究。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成果,一是董作宾在“看见她”专号上所发表的《一首歌谣整理研究的尝试》。著者把流传在国内各地方的一首歌谣《隔着帘子看见她》的45个异文汇集起来,研究的方法是,首先考察其地理分布,把这些异文分别划进不同的文化区域当中;之后考订这些文字记录,作出必要的修正;最后运用比较方法,从作品所描写的一位青年初到丈人家相亲的风俗、所运用的方言和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细致的分析。这篇论文开创了歌谣比较研究的一个先例。

二是顾颉刚的“孟姜女”专号上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这是作者对此一传说进行大规模研究的起步,经几年继续征集资料和精心探讨,最后形成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3辑,后来在中山大学出版。顾颉刚在孟姜女传说研究,把从先秦以来历代有关文献资料与现时的口头流传资料结合起来,按历史和地理两大系统整理,看清了故事随时代演变的脉落和在传播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地域风俗特点。作者指出,作品在文人笔下和群众口头上有不同形态,是人民群众根据自己的理解使故事发生了转变。这项研究在20年代民俗学初创阶段,已达到较高的水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所建立的研究模式,即将文献资料与口头传说资料联系起来进行梳理,经比较和辨别,最后认清民间传说的历史演变过程,它在以后不断被许多人所模仿。

此外,北大歌谣学时期的民俗学还有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如顾颉刚的《吴歌小史》、刘经庵的《歌谣与妇女》等论文、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具有民俗学启蒙性质的文集)、胡朴安编的《中华全国风俗志》等。北京大学于1923年5月成立的“风俗调查会”,讨论修订了一份由张竟生提出的“风俗调查表”,反映出学者对民俗范围的认识,包括“环境”、“思想”、“习惯”三大项共54目。调查会于1925年组织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5人到北京西郊妙峰山调查“朝山进香”风俗,成为中国民俗学在开始阶段的一次实地进行科学考察的范例,调查报告和研究心得先在《京报》上发表,后来都收进1927年出版的《妙峰山》一书当中。

总的来看,五四时期的“歌谣学”已具有民俗学性质,也开始出现对歌谣以外民俗现象的研究,所以说,此时是民俗学正被倡导和发起的阶段。

二、形成阶段:中山大学和杭州等地的民俗学活动(1927—1937)

1927年11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会”成立,广州中山大学由此成为北京大学之后的又一个民俗学运动中心。不久,在中山大学直接、间接影响下,厦门、福州、浙江鄞县、广东揭阳、杭州、四川等地也相继成立民俗学的团体。加上还有一些地方出版民俗学刊物,可以看出作为新兴学术的民俗研究,已经从发源地的北京向外推广,特别是在南方活跃了起来。形成这种局面的一个直接原因,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已经退潮,北大一批教授不甘寂寞,纷纷南下,一些人到了新的革命策源地——广州,国立中山大学成了他们集结的一个地点。这些人中的傅斯年、顾颉刚、董作宾等对中山大学民俗学中心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容肇祖、钟敬文、刘万章、杨成志等则在这个大本营里实际担当重任,成为中坚力量。

中大民俗学会的工作按照初订的计划开展,取得了四方面成绩。第一,建立了民俗陈列室;第二,1928年派史禄国(俄籍)、容肇祖、杨成志赴云南调查少数民族,后来发表多种报告;第三,举办了民俗学传习班;第四,出版《民俗》周刊和民俗学丛书等。^④

《民俗》周刊物1928年3月创刊,其前身是由钟敬文、董作宾编辑《民间文艺》周刊,共12期。《民俗》周刊出到第110期而暂停,先后由钟敬文、容肇祖、刘万章主编。1930年3月复刊,由容肇祖主编,仅出13期,至第123期停止。过了6年之后,即1936年9月,杨成志主编出版《民俗》季刊。此季刊出到第1

卷第3期,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停顿,到1942年才又恢复出版第4期,接着出版了第2卷1—4期,于1943年底最终结束。钟敬文是最后两期季刊的主编。中山大学《民俗》周刊和季刊在继北京大学《歌谣》周刊之后,第一个坚持时间最长和最有影响的民俗学刊物。据统计,前两年多的123期周刊,共发表有178篇故事,112篇传说,161篇民谣,38篇谜语,9篇谚语,130篇习俗报告,44篇信仰报告和196篇研究论文等。此外,周刊还经常采用专号形式,题目名称有:神、谜语、歌谣、故事、传说、槟榔、蚕民、清明、中秋、新年、祝英台故事、王昭君、山海经、妙峰山进香。^⑤

民俗学丛书共出版36册,包括歌谣集、故事传说集、各地习俗和信仰调查、研究性论著及介绍国外理论方法的编译等。比起北大歌谣研究会时期,数量大大增加,而且研究范围的扩展和理论的加强都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刘万章《广州民间故事》、张清水《海龙王的女儿》、钱南扬《祝英台故事集》、杨成志、钟敬文《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杨成志《民俗学问题格》、崔载阳《勿民心理与各种社会制度之起源》、魏应麒《福建三神考》、容肇祖《迷信与传说》等。

中山大学民俗学研究范围的扩大,反映出这门新学术对民众思想与传承文化欲进行全面研究的追求。它已经不再单纯受文学革命浪潮的制约,而是将民间文学的研究作为民俗学建设的一个局部。我们可以从顾颉刚所拟的《民俗》周刊发刊词看出,中大民俗学的指导思想是强调通过对民众生活、思想和创造的认识,来达到认识“整个社会”和“全民众历史”的目的。让人们感觉到“这个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杨堃1948)。

中大民俗学还有一种倾向就是重视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杨成志对云南少数民族做了两年的调查,并写成了《云南民族调查报告》、《云南佬佬族的巫师及其经典》等。这说明民俗学与民族学发生了联系。此外,社会学也影响到民俗研究,何思敬《民俗学的问题》(载创刊号)中说:“我之注意于民俗学是出于社会学研究之必要;盖民俗学可以供给许多资料来说明社会的事物之传承的和集合的方面。”

对国外民俗学理论著作的翻译和引进,也是从中山大学开始的。杨成志所译的《民俗学问题格》、他和钟敬文合译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原文均出自英国班恩(Burne)的《民俗学手册》。译文的发表给学者们以刺激。陈锡襄的《风俗学试探》(《民俗》周刊第57—59集)可视为一种反应,这篇论文在提出建立区别于民俗学的风俗学的同时,考察了民俗学的学术位置,设计了对风俗事实的分类模型。何思敬的《民俗学的问题》,对英国民俗学与其它学科之间关系作了清楚的介绍。此时,中山大学之外的一些学者出版了普及国外研究成果或者运用国外理论及方法来研究中国材料的民俗学专著。如黄石的《神话研究》(1927年)、赵景深的《童话论集》、《童话概要》(1928)、玄珠(茅盾)的《中国神话ABC》、《神话杂论》(1929)等。而在信仰习俗研究方面,江绍源的《发须爪》产生了较大影响,是用英国人类学派有关巫术和原始宗教的理论来研究中国材料的一个尝试。

中山大学民俗学活跃地进行了两三年,正在因《民俗》周刊暂停而有所冷落之时,杭州又成为民俗学的第三发祥地。钟敬文1928年秋从广州到杭州教书,一年后,他与浙江大学的钱南扬,共同开辟了杭州《民国日报》副刊之一的《民俗周刊》,共出9期。1930年,他又与江绍原、姜子匡组织了一个“杭州民俗学会”。据考证,这学会大约在1932年夏秋之间才进一步组成为“中国民俗学会”。^⑥《民俗周刊》又作为这先后两个民俗学会的中心刊物,连续出了150期,至1935年初。

钟敬文、姜子匡与陶茂康还合编了12期《民间》月刊,时间是1931年6月至1934年4月。姜子匡主编的《妇女与儿童》,共出8期,时间是从1935年9月开始。1937年1月,《妇女与儿童》改作《孟姜女》,出了5期后到抗战前夕而停止。此外,钟敬文于1933年到1935年在《艺风》杂志上编了10期《民俗园地》,又编了三个专号。

杭州中国民俗学会还编辑了12种书稿,其中多数出版。但最有影响的研究成果是由学会编辑的《民俗学集纂》,共两辑。第一辑中的论文《民俗学的对象任务及方法》(汪馥泉)、《民俗学是什么以及今后研究的方向》(乐嗣炳)等,说明学者们对民俗学基本理论问题十分重视。其它重要论文有钟敬文的《金华斗牛的风俗》、《中国的地方传说》、《中国民间故事类型》、黄石的《“迎紫姑”之史的考察》、《苗人的跳月》、钱南扬的《从祭礼说起》。第二辑中有黄石《满洲的跳神》、钱南扬《谶诗小考》、顾颉刚《周汉风俗和传说琐拾》,以及好几篇民俗学译文。对杭州这段民俗学发展的历史,钟敬文在《我与浙江民间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中曾总结四点成绩。第一,扩大了民俗资料的收集范围;第二,加强了对民俗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这表现在这方面的翻译工作和讨论之上,也表现在“个人研究意识的提高”之上。钟敬文从1934年至1936年特意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研究民俗学,回国前发表《民间文艺

学的建设》，想“创设一种独立的系统的科学”。第二、开拓了国际同行间交流合作工作的局面，如德国民俗学家爱伯哈特(W·Eberhard)同中国民俗学会进行了交流。第四，带动了地方性民俗工作的新展开。

到1936年，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复刊，同年在北京又成立了“风谣学会”。《歌谣》复刊后，改称第2卷，出40期，第3卷又出13期，因“七·七”事变而告终止。这一年中山大学《民俗》(季刊)亦复刊。可以说，中国民俗学的三大研究中心，此时正鼎足而立，遥相呼应，迎着学术大发展时期的到来，可惜因遇抗日战争爆发而受到挫折。

纵观中国民俗学第二阶段的发展过程，其基本特点是四个方面：一是研究范围的扩大；二是对本学科理论方法问题的重视，同时与相关的现代社会科学发生合作关系；三是与国外学界同行开始有所交流；四是出现了一批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关于著作，除了上文已提及者之外，还可举出一些：

1928年：钱南扬《谜史》、钟敬文编《歌谣论集》、谢六逸《神话学ABC》；

1929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

1930年：赵景深《民间故事丛话》；

1932年：江绍原编译《现代英言利语俗及谣俗学》、胡愈之译(法国Besson著)《图腾主义》、姜子匡《中国新年风俗志》；

1933年：郑振铎《汤祷篇》(1935年《玄鸟篇》)、李景汉、张世文《定县秧歌选》、李家瑞《北平俗曲略》；

1934年：林惠祥《民俗学》、黄芝冈《中国的水神》、凌纯声《松花江上游的赫哲族》、郑振铎译(柯克士著)《民俗学浅说》、卫聚贤《天地开辟与盘古传说的探源》、鲁迅《门外文谈》；

1936年：费孝通《花蓝瑶社会组织》、李安宅译(Malinowski著)《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等。

这个阶段，中国民俗学在诸多研究方向上取得进展，并出现一些在理论方法运用与创新方面较为成功的范例，这表明民俗学中国在已经初步形成。

三、缓进阶段：战争年代民俗学 在各区域中的进展(1937—1949年)

由于抗日战争爆发，1937年以后，民俗学已有的机构和刊物不能继续下去。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8年当中，民俗学者及对民间文艺进行搜集与研究的一些文艺家，分别在三个区域中，面对新的环境，从事接近民众的调查和开展学术文化活动。这三个区域的民俗学，情况有很大不同。大体来说，在西南大后方，民俗学与民族学结合得更为紧密；在西北陕甘宁边区和华北等地的抗日根据地里，对民间文学的搜集、讨论及学习运用，成为了主要的工作；在沦陷区，一些学者坚持了自主的民俗学调查与著述。

(一)西南大后方民俗学与民族学的结合

抗战初期，许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纷纷向西南大后方迁移。很多学者在进入西南各省之后，都对少数民族历史、现状的调查发生兴趣，并在原有民族学机构的基础上，组成了众多考察团开展实地调查。例如，1937年8月，上海大夏大学迁往贵州，设立社会研究部，用4年时间分往贵州各地调查，最终写成《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歌谣》、以及关于服饰、语言、生活、艺术等专题的著作。西南联合大学湘一黔步行团，在闻一多带领下，两个月当中一路采集歌谣。其中刘兆吉共得2000余首，整理成《西南采风录》(1946年出版)。再如作家光未然，曾调查记录阿细人创世史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出版)，等。

作为民俗学重要一支的神话学，在西南取得重大进展。本来在抗战前，关于民族神话已有余永梁、钟敬文等人进行过开创性研究。钟敬文在日本发表的《盘瓠神话的考察》，根据文献和采自广东、浙江畲族的材料以及朝鲜有关记录，运用关于氏族图腾等理论进行分析，断定“犬是某个南方少数民族的图腾动物，盘瓠神话是荒远的古代人们所编造的关于民族血统来源的说明神话”，而“这些相互关联的制度、神话、风习等，也因为氏族社会的进步、分化——主要是狩猎文化阶段进到半狩猎半耕种的文化阶段——而逐渐变形的。”^⑦西南民族考察活动中搜集到大量神话及相关习俗的资料，使得学者们的神话研究具备了能够进一步突破的条件。关于盘瓠神话，岑家梧《盘瓠传说与瑶畲的图腾制度》^⑧、凌纯声《畲民图腾文化研究》^⑨、马长寿《苗瑶之起源神话》^⑩等均进一步考察了它的族属，认为只在瑶、畲两民族才有此神话。芮逸夫、凌纯声早在1933年就开始在湘西作调查，他们写成《湘西苗族调查报告》^⑪，对苗族

人口分布、经济、家庭、巫术宗教等给予描述,同时提出神话与仪式、风俗、社会组织等文化构成有机联系的观点。芮逸夫《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⑧也是当时重要的神话学力作。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期间写了多篇神话学论文,他最有贡献的成果是3万多字的《伏羲考》^⑨,运用考古学、民俗学、人类学资料,进行考证,指出了南方葫芦文化与兄妹洪水神话之间的线索,是神话学上一个新的发现。

在民俗学刊物和组织方面,顾颉刚和姜子匡在1943年9月主编的《风土杂志》(月刊)创刊,其宗旨为:“研究人生社会,介绍风土人情”。内容有各民族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探讨文章与作品。至1949年10月,共出1—3卷计13期。同年冬,顾颉刚、陈锡襄、黄芝冈、罗香林、姜子匡、樊演、于飞等在重庆召开两次座谈会,筹备组织中国民俗学会,出版《风物志》刊物等。1944年1月,学会正式出版的《风物志》,亦由顾颉刚、姜子匡主编,公布宗旨:该刊物系民俗学、民族学、文化史、社会史类刊。但此刊只见一册。1934年底成立的中国民族学会抗战期间从南京西迁,因会员多在昆明,于1939年夏建立云南民族学会。所编辑的《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期也于1940年出版,至1948年共出6期,其中有诸多民族学者撰写有关民俗的论文。

(二)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民间文艺的调查研究与鉴借

边区和根据地的知识界,在对民众生活与文化进行观察和体验方面,从整体上看,达到了十分深入的程度,这是其它区域不能相比的。为了创作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大批作家和艺术家积极搜集民间文艺,以此作为向群众学习,熟悉他们思想感情和运用民族艺术传统进行创作的有力方式。但是从学术角度来看,这种因偏重民间文艺,而忽略对其它风格习惯进行调查研究的情况,必然会限制民俗学的全面开展^⑩。边区的知识分子对民间歌谣、故事、谚语、剪纸、年画、秧歌表演、说唱艺术等各种文艺传统都进行了广泛的搜集,但由于直接的目的是给人民新文艺的创作提供借鉴,所以学术研究目的就相对减弱。

边区专门从事民间文艺研究的团体并不很多,但几乎所有艺术家的组织机构都把民间文艺调查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值得重视的是,1939年春延安成立了“民歌研究会”,1941年2月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吕骥、李焕之等许多音乐家都参加进这个组织。他们在1945年以前的6年当中,共组织过10次对民间音乐和艺人的调查,曾拟定民歌记录纸格式。汇集印刷有《秦腔音乐》、《关中民歌》、《吆号子》、《陇东民歌》、《三边民歌》及《眉户曲谱》等9册资料集。出版《民间音乐论文集》共2辑^⑪。该组织的“晋察冀分会”也曾印出两册《民歌集》。鲁迅艺术学院的何其芳、张松如等编选了《陕北民歌选》,于1945年出版。书中有406首民歌,附曲谱97种,对歌谣中的方言、隐喻、风俗事物等都详加注释,对一些民歌的异文也给予注明。何其芳等人的工作在学术规范上,特别是实地调查的规范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准。诗人李季辑录民歌“信天游”达3000首,后在1950年出版了《信天游》一书。

边区文艺界在抗战时期和在1945年以后,都注意搜集民间故事、谚语、窗花等其它民间文艺,如当时出版的作品集就有马烽、束为编《水推长城》等三册故事集、合江鲁艺编《民间故事》、董均伦编《半弯镰刀》、钱毅编《庄稼话》(谚语)、陈叔亮编《窗花》等。

民间文艺理论研究成果相对欠缺,但对民间音乐、秧歌、说书以及民间艺人等研究方面,发表有一些重要论著,如艾思奇等著《秧歌论文选集》(东北分店,1947)、吕骥等著《民间音乐论文集》(第2辑)、李季《我是怎样学习民歌的》、周扬等著《民间艺术和艺人》(东北书店,1947)等。

(三)沦陷区的民俗学研究

北平的几个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一些学者,或闭门研究,或派学生在京郊调查,在民俗学研究上亦作出几项成绩。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所出《社会学界》刊登了B·Malinowski的《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与吴文藻的《文化表格说明》(第10卷,1939年),另外有A·R·Radcliffe-Brown的《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以及赵承信、林耀华、R·Hirth、黄迪等人关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重要论文(第9卷,1937年),说明功能学派(Functionalism)和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ies)方法已为中国社会学者所采纳。因此,燕京大学重视田野作业,曾开辟清河镇为实验区(调查地),后因“七·七”事变,改到前八家村。师生们所写成的调查报告,如果从民俗学应当研究民众生活的角度来看,和民俗学就有密切关系。杨堃担任燕大社会学系教学以后,从1938—1941年,他所指导的学士论文19本,多是民俗学或民族学性质的,如李慰祖《四大门》、狐狸、黄鼠狼、刺猬、蛇》和陈封雄《死亡礼俗》、石甯生《性生活》、虞权《住宅设备与家庭生活》等几篇对前八家村的民俗调查报告,都是以前中国民俗学所没有过的。

1941年冬成立的中法汉学研究所,主要工作也是对民俗学资料的搜集与研究,而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不同之点,在于重视对已有地方志风俗资料的整理。杨堃承担《五祀考》课题,并筹备民俗季刊(中、法两种文字),稿件已齐因经费问题而未出。在该所《汉学》期刊上,发表有杨堃的《灶神考》、孙楷第的《傀儡戏考源》、傅惜华的《六朝志怪小说之存佚》等。此外还有《民间新年神像图画展览会》目录一书。

辅仁大学建有东方民族学博物馆,实为民俗文物陈列馆。1942年起出版《民俗学志》年刊(英、法、德三种文字)。

学者个人所著方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虽属于史学巨篇,但对远古以来神话传说的研究亦作出了重要贡献。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1937),征引书目近500种,较全面地反映了历代北京的风土人情。

抗战胜利后至1949年期间,民俗学研究主要是前些年工作的延续,未有大进展。张亚雄在兰州自刊出版的民歌《花儿集》(1948)、江应梁的《西南边疆民族论丛》、《凉山夷族的奴隶制度》(1948)都属重要者。

四、转移阶段:50—60年代民间文学搜集与研究(1949—1966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搜集、研究民间文学的工作成为新中国文艺和文化事业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召开的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扬在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中说:解放区文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和自己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保持了密切的血肉关系”;“文艺工作者在搜集研究与改造各种民间形式上都做了不少的工作”。这些话,实际上也为新中国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工作指定了一个重要位置。

195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郭沫若任理事长,老舍、钟敬文任副理事长。不久,《光明日报》开辟了《民间文艺》副刊;民间文艺研究会编辑了《民间文艺集刊》(至1951年共出了3期)。钟敬文在集刊上发表了《口头文学——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阐明民间文学具有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真实性,具有与封建统治阶级对立的思想感情,具有艺术上的某些优点。因此,认为民间文学对新中国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认为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有五点:1.保存珍贵的文学遗产;2.学习民间文艺的优点;3.从民间文艺里接受民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作为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真实史料;5.发展民间文艺。

在50—6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主要被作为发展文学事业的一项重要工作。虽然史学界在讨论有关农民起义等问题时,曾对一些民间传说的资料价值给予重视,但总的来说,如何发挥民间文学作为文学的教育、认识和审美娱乐作用,成为大多数搜集研究者主要关心的目的。民间文学本来是与民众生活和风俗习惯密不可分的,但从民俗学角度来研究它的方法却暂时被冷落。这种文艺学性质的研究方向一直坚持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民间文学的研究当中,而到80年代中和9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才与民俗学研究开始结合。目前以民俗学的角度研究民间文学,或者说把民间文学当成民俗组成部分的观点,已经占上风。不过,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队伍中,以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为突破口,利用几十年来民间文学的搜集成果,来构造民族文学整体研究学术体系的努力,也初见成效,从这样一个过程的描述来看,50—60年代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由于文艺学方向的一度加强,本来就包括民间文学研究在内的民俗学,发生了方向上的大转移,但不应该说民俗学已经完全不存在。当然,从民俗学需要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不能代替民俗学,所以,民俗学时隔30年的恢复,才成为正确的选择。

50—60年代,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大量发掘出来。1955年4月创刊的《民间文学》月刊,至1966年停刊,共107期,主要刊发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兼有评论。各地出版了众多的民歌、民间故事、传说、长篇叙事诗、民间戏曲与说唱等作品集。涌现出一些知名的民间文学搜集家。

民间文学课程在许多大学中文系里开设,钟敬文从1953年起开始培养本专业研究生。在学术研究方面,有一些较有影响的论文。如钟敬文《晚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1963)、何其芳《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中的问题》(1961)、贾芝《民间故事的魅力》(《中国民间故事选》二集序言,1961)、何其芳《关于梁山伯祝英台故事》(《民间文艺集刊》第二册,1951)、许钰《民间文学中巧匠的典型——关于鲁班传说》

(1963)、汪玢玲《试论长白山区人参的传说》(1959)、吴超《传说与历史》(1963)、刘守华《民间童话与神话传说》、魏同贤《漫论新故事》、严辰《论民歌》、王浩、黄荣恩《“花儿”源流初探》(1962)、李赐《试谈爬山歌》(1957)、徐国琼《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1959)、孙剑冰《〈阿诗玛〉试论》(1956)、天鹰《哭嫁歌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62)、王毅《略论中国谚语》(1961)^①等。研究专著尚不很多,有朱自清《中国歌谣》(据1929—1931清华大学讲义整理,1957)天鹰《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列》(1956)、李岳南《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1957)、关德栋《曲艺论集》(1958)等。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是这一阶段最有特点的工作,其成绩是以往不能相比的。如《贵州省民间文学资料》从1957年到1960年编印出45集,包括苗、布依、侗、彝等民族的史诗、叙事诗、歌谣、故事等,“文化大革命”以后又继续编印至72集,此外还有《侗族民间文学资料汇编》从1959年起编印,现所见者约20集左右。至于经过初步记录和整理的资料就更多。

“文化大革命”(1966—1976)期间,民间文学工作停顿。

197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正式恢复,29个省区建立分会(“文化大革命”前仅有8个分会)。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取得了飞快进展。期刊已不只是《民间文学》,出版的著作和作品集也大幅度增加,理论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1981年中国民研会召开首届年会,至1988年开第4届。许多分会也开始召开年会或专题研讨会。《民间文学论坛》于1982年创刊,贾芝拟写的发刊词《多角度地研究民间文学》中指出:“(民间文学)作品的记录和积累,历史与民俗学的调查,必然不断产生新的研究成果。那么,积极创刊《论坛》就显得很有必要了”,还说“不记录围绕作品的民俗材料,就不能全面地了解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的作品,不了解它们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什么场合演唱和讲述的,它们在一个民族或在一个地区社会生活中怎样发挥作用,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作品的内容和性质。只记录文学,就不能透彻地了解文学。”^②这标明,从单一文学角度研究民间文学的阶段已经终结,民间文学研究与民俗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局面开始形成。

五、复兴阶段:当代中国民俗学 (1978——)

几乎是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筹备恢复的同时,民俗学也开始恢复。1978年顾颉刚在认真填写民间文艺研究会“会员登记表”的文字中,呼吁加强民俗学的工作。同年秋,由钟敬文草拟,由顾颉刚、白寿彝、容肇祖、杨堃、杨成志、罗致平、钟敬文联名,向中国社科院递交了关于恢复民俗学的倡议书,1979年11月召开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4次代表大会时,又以《建立民俗学及有关研究机构的倡议书》为题印发给代表,12月份《民间文学》转载。

经一段时间筹备,中国民俗学会于1983年5月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已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民俗组”(1980年)、辽宁省民俗学会(1981)、吉林省民俗学会、浙江省民俗学会(1982)等建立,而在此之后各地民俗学组织更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从民俗学恢复到现在,已将近20年,而发展最快的时间是在中国民俗学会举办了第一次民俗学讲习班之后,即1984年以来。如果对这十几年出版的刊物、著作、资料稍加详述的话,那将是本文篇幅难以胜任的,故此,仅简列如下。

(一)刊物

《民间文学论坛》(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1987年改名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1982—)、《民俗研究》季刊(山东大学,1985—)、《民间文学季刊》(上海民间文艺家协会,1986—1990)是最有影响的三大民俗学研究刊物。后者,从1991年6月起以《中国民间文化》丛书形式继续出版,已出20期。《民俗》,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1988年创办,原为画刊,1991年起改为文字刊,现为双月刊。《广东民俗》季刊,广东省文化厅和广东省民俗文化研究会主办,1995年创刊。全国还有地方性民俗学刊物多种。

(二)丛书

“中国本土文化丛书”出书10多种,中国华侨出版公司。有陶思炎《中国鱼文化》、郭子升《北京庙会旧俗》、张铭远《生殖崇拜与死亡抗拒》等。

“中国本土文化丛书”已出书20余种,上海三联书店。其中有张紫晨《中国巫术》、乌丙安《神秘的萨

满世界》、宋兆麟《共夫制与共妻制》、夏之乾《神判》、曲彦斌《中国民间秘密语》、林河《〈九歌〉与沅湘民俗》、徐山《雷神崇拜》、郭泮溪《中国民间游戏与竞技》、王子今《门祭与门神崇拜》等。李星星《曲折的回归——四川酉水土家族文化考察札记》和郑土有、王贤森《中国城隍信仰》值得注意。前者属于作者在田野作业中的观察,后者结合实地采访与观察,运用多方面文献资料对城隍信仰及其仪式的性质和作用作出了探讨。

“中国民间文化丛书”,刘魁立主编,浙江教育出版社。“中国民俗文化研究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有高国藩《敦煌民俗学》、刘守华《比较故事学》等。“中国民俗·旅游丛书”,全国每省一卷,旅游教育出版社。“中国风俗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汉族民间风俗丛书”,广西教育出版社。“中国民俗艺术·工艺文化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中华民俗文丛”20册,刘锡诚等主编,学苑出版社,此“文丛”具有中国民间信仰资料集成及系统研究性质。“域外民俗学丛刊”和“世界民间文化译丛”等,是介绍国外民俗学理论研究成果的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

(三)民俗资料汇编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等6个大区,共1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70余种。

(四)民俗志

山曼、李万鹏、叶涛等《山东民俗》(山东友谊书社)是发端之作,有示范意义。后出的有刘兆元《海州民俗志》(江苏文艺出版社)、《中州民俗丛书》多种(中州古籍出版社)、再有《浙江风俗简志》、《青海风俗简志》等。其它按不同行政或自然区域为单位的民俗志,数量很多。以民族为单位的,如邢莉《游牧文化》(北京燕山出版社)、廖东凡《雪域西藏风情录》等多种。值得注意的是,已经有若干种以村落为单位的民俗志或村志资料出版,如(山西)《下院村志》、(河北)《南庄村志》、《耿村民俗志》、《铁匠庄志》等。

在各省地方志编纂当中,民俗志十分引人注目,如《河南省志·民俗志》、《山东省志·民俗卷》等出版以后,立即受到学术界的欢迎。

(五)著作

在基础理论方面,乌丙安《中国民俗学》、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陶立璠《民俗学概论》、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在教学和普及民俗学理论方面,已收到明显效果。现在钟敬文主编的《民俗学概论》,已经修定将出版。高丙中《民俗文化与传统生活》通过反思中外民俗学史及相关学术思想,提出了自己对民俗学研究取向方面的主张。

老一辈民俗学家的文集或专著有:《钟敬文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马学良《云南彝族礼俗研究文集》(四川民族出版社)、《杨成志民俗学译述与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江绍原《中国礼俗迷信》(渤海湾出版公司)等。钟敬文《民俗学:梗概与兴起》(中华书局)是在90年代中国民俗学需要重新明确自己的学术位置与走向的情势下,通过总结过去和现实经验而提出的建设性思想成果。

90年代民俗学专著出版增多,除在前面丛书介绍中所提到的之外,还有几部书,想特别提出。姜彬主编的《吴越民间信仰民俗——吴越地区民间信仰与民间文艺关系的考察和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是由上海、江苏、浙江一些民俗学者和在基层工作的人员集体撰写的,基本材料是由实地考察所得,因此在描述与分析上都达到新的水平。张振犁著《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是在作者多年实地调查基础上,对古典神话流变的特点、规律等,作出新的分析和结论,这在中国神话学史上是一次突破性尝试。巫瑞书著《荆湘民间文学与楚文化》(岳麓书社,1996)分为“导论”、“神话传说编”、“史诗歌谣编”、“巫舞傩戏编”、“余论”,将民间文学放到楚文化的历史地域当中加以考察,不仅是自己长期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一个总结,也代表了用民俗学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的一种模式。程蔷、董乃斌著《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用民俗学视角研究唐代文学,既为文学史研究开辟一条新路,又对历史民俗学的建构作出尝试。其实,这种尝试对以往唐代史研究相对忽略社会生活现象的缺陷,又是一种补充。此外,象顾希佳《江南桑蚕文化》、蔡丰明《江南民间社戏》、袁学骏《耿村民间文学论稿》等,都有一定质量。

神话学、傩戏与巫文化、庙会调查等诸多方面都还有一些重要专著出版。兹不赘述。

可以看出,当前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突破了80年代以前研究范围的狭窄以及方法的局限。以实地调查为基本手段,对民俗生活作整体观察的主张也开始成为风气。

结 语

中国民俗学从发起之始,80年当中受中国社会与政治变动的影响,几经演进与波折。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民族文化自觉的要求都深刻地规定了这门新兴学术的特殊地位,同时在这种密切关系中也表现出民俗学学术自身独立发展的某些不够强壮的弱点。由于近20年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学术的大背景下,民俗学不失时机地被恢复起来并造成一定声势,不仅多少适应了国情认识的需要,也重新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关于理论、方法的问题,就一些学者的贡献而言,几个发展阶段中,特别是前两个阶段中,民俗学研究中国事实的方法建构与成果示范都曾具有标志性意义和对于整个学术界的影响力。相比之下,在总结近20年成绩的时候,发表文章和出版物的数量固然增多,而相对于某些学术而言,民俗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建树似乎不能令人满足。但值得重视的是,民俗学的田野作业虽然在规范与力度上还存在不足,却毕竟大大超过了二、三十年代。另一方面,民俗学作为一种现代性的学问,它与其它学科的联系也于近20年中被加强了。所以从全局而言,民俗学正以自己熟悉民众生活、民俗传承与创造的优势,积极参与到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科学认识当中。这一态势表明,由于民俗学对民俗现象与民众生活的描述本身不仅包含着重要的科学价值,而且这些描述还渗透着对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认识和解释的能力,因此,它并不简单是为其它学科提供资料而已。本文在举例说明近20年民俗学重新复兴时,虽然着重在那些民俗学本性质质的著作,但即使是这些著作也同时或多或少具有参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建设的意识。我们应当相信,只要民俗学在纠正传统学问忽视民众社会偏向的同时不使自己走进另一种封闭境地,其理论、方法的建树就会在更为坚实有力的基础上形成。

民间的传承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的社会生活性质,是目前民俗学者关于所研究对象的共识。这种认识体现了学理上的前进与明晰化,此外还有对民俗特征的概括,对民俗事象的各种描述方法与解释方法等。理论认识当然还要提高,但民俗学是更多地具有实证性和体验性的学问。从根本上说,对民俗事象和生活文化进行真切与深入的描述,正是它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一大特点。民俗志不仅是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也是基本的学术方法。献出具有深刻观察和解释力的描述,显然是本学科今后真正有所发展的主体性工作。

中国民俗学走过了80年历程,前辈的成就曾不断指向新的学术追求,而包括健在的前辈在内的今人的奋斗,可能正使这门学问进入一个真正发展的阶段。

注释

①二著均有前期出版过的书作为基础,即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1985)和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发展史》(1987)

②赵世瑜此著对“中国现代民俗学”(1918—1937)所形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思想和学术渊源、基本性质和特点、主要代表人物思想及治学方法个案等,进行了新的深入探讨。本文在相关问题上多有参考。

③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1934年芝加哥版,转引自直江广治著《中国民俗学史》,王建朗等译《中国民俗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④据杨成志《民俗学会的经过及其出版物目录一览》,《民俗》季刊第1卷第1期,广州,1936年5月。

⑤据直江广治《中国民俗学史》(1991)。

⑥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 P232—235,巴蜀书社,1995年。

⑦《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

⑧⑩⑫均收入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6本,1947。

⑪商务印书馆,1947年。

⑬王文宝(1995)记有延安《解放日报》刊发的几篇民俗调查与研究文章。

⑭见《八年来的中国音乐研究会》,中国音乐研究会编《民间音乐论文集》,东北书店,1947年。

⑮参考杨堃《我国民俗运动史略》,《民族学研究集刊》第8期,1948年8月。

⑯见《中国民间文学论文选(1949—1979)》1—3册,上海民间文艺出版社,1980年。

⑰又见贾芝《播谷集·开拓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作者简介】刘铁梁,男,1946年生,辽宁绥中县人。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